

## 《摩诃婆罗多》全本汉译的意义

郁 龙 余

[印]毗耶娑《摩诃婆罗多》，黄宝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并称印度两大史诗，是人类文化遗产中的瑰宝。《摩诃婆罗多》号称“十万本集”，以篇幅浩繁、内容包罗万象、思想玄奥精深闻名于世。它长期以说唱形式流传，是印度“飘浮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印度学者从七百多种不同文本中，按照“尽可能古老”的原则，编辑、审定、校注出了一种权威的、令人信服的“精校本”。对《摩诃婆罗多》的翻译与研究，一直被视为判断一个国家印度学学术水平的重要标志。迄今为止，世界上大多只有《摩诃婆罗多》的选译本或准全译本。真正的全译本，只有出版于1883至1893年的散文体英译本、出版于1895至1905年的诗体英译本及中国由金克木肇始、黄宝生主持完成的汉译本。前两本都出自印度学者之手，中国学者完成的这部汉译全本，是和印度精校梵文本、英译本并称的《摩诃婆罗多》的第三大本。

这部500万言汉译全本的问世，实非易事。季羨林于1946年在北京大学开创东语

系，筚路蓝缕，惨淡经营。1960年，他和金克木合作开设梵文、巴利文班开始培养学生。而《摩诃婆罗多》的主要译者黄宝生、赵国华、郭良鋆等，都是这个班的毕业生。1960年开班，到2005年翻译出版《摩诃婆罗多》，中间经历了45年。其间，金克木于2000年以米寿逝世，他的学生赵国华则于1991年英年早逝，年仅48岁。赵国华在第一卷《初篇》的译后记中感叹自己要为它“倾尽满腔热血、付出整个生命”，不幸一言成谶，令人痛惜。后黄宝生担纲主持译务，历十多年终成胜局。《摩诃婆罗多》汉译全本的问世，显示出我国在两千年译经过程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翻译外国超大型经典的传统后继有人。

《摩诃婆罗多》这部史诗，不仅是宗教经典、政治理论，还是诗歌艺术，是迦梨陀娑、跋娑、婆罗维、摩伽、室利诃奢及王顶等后世诗人和剧作家的创作动力和源泉，“如果没有《摩诃婆罗多》，就没有这么众多的伟大诗人创作出这样丰富的梵语文学。”中国学者对《摩诃婆罗多》的高度重视，也首先基于它的文学意义。20世纪80年代，季羨林翻译的《罗摩衍那》的问

世，激发了中国专业人士研究两大史诗的热情，将两大史诗的研究大大推进一步，产生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如季羨林的《罗摩衍那初探》，季羨林、刘安武编译的《印度两大史诗评论汇编》，刘安武的《印度两大史诗研究》等。现在，全译本的问世，为我们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大量新材料和新课题。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黄宝生提出的中国史诗理论问题。

关于中国史诗的讨论由来已久。黑格尔在《美学》一书中详细论述希腊史诗之后，论及东方史诗时，他认为只有印度和波斯才能看到真正的史诗，“中国人却没有民族史诗，因为他们的观照方式基本上是散文性的，从有史以来最早的时期就已形成一种以散文形式安排的井井有条的历史实际情况，他们的宗教观也不适宜于艺术表现，这对史诗的发展也是一种大障碍。”匈牙利学者杜克义（Ferenc Tökei）也认为中国没有史诗，只有“哀歌”（屈原作品），是家长制社会限制了史诗发展。但美籍华裔学者王靖献认为《诗经》中《生民》、《公刘》等五篇作品是史诗。与王靖献的观点相呼应，章培恒、骆玉明的《中国文学史》认为：“《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五篇是一组周民族的史诗，记述了从周民族的始祖后稷到周王朝的创立者武王灭商的历史。”正是在这些观点的引导与启发下，张松如、郭杰写出了《周族史诗研究》这样的学术专著。

黄宝生在主持翻译《摩诃婆罗多》的过程中，也非常关注“中国史诗”问题的讨论，并在这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学术思考。他认为，史诗概念，无论是发展还是消解，都要有学理的支持，国内学术界应当加强史诗理论建设，以免在史诗理论的表述和应用中互相矛盾。黄宝生认为，史诗通常是长篇叙事诗，“而现在国内有倾向将在题材与内

容上与史诗类似的短篇叙事诗也称作史诗，这在理论上能否成立？如果能成立，那么，我们就应该在史诗定义中去掉‘长篇’这个限制词，正如在小说的一般定义中无须加上篇幅的限制词。最明显的例子是，在国内一些论著中，将《诗经》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和《大明》等诗篇确认为史诗。倘若此说能成立，那么，接踵而来的问题是，在中国历代诗歌中，凡涉及重大历史事件和英雄业绩的诗篇，是否也都能称作史诗？而且，在世界各国古代诗歌中，也有许多这类题材的民歌、民谣和短篇叙事诗，其中有些被吸收进史诗，有些与史诗并行存在，是否也可以一律称作史诗？这关乎世界文学中文体分类的一个大问题。”现在，《摩诃婆罗多》的翻译出版，无疑为我国史诗理论研究增添了一份重要的资料。而且除此之外，口传文学、文学发生学、文学传播学、文学生态学、比较文学（包括比较故事学、比较神话学）、比较诗学等领域，也都有待我们做出新的开拓。

联系中印两国的高速发展及面临的文化政治格局，《摩诃婆罗多》的意义并不局限于文学。正如黄宝生所指出：“《摩诃婆罗多》是一部‘活着’的史诗，它呈现现代世界的社会和人生问题，期盼现代人不畏艰难，继续努力解决人类生存方式的困境，开创自由、和谐、繁荣和幸福的新时代。”

《摩诃婆罗多》的主要故事，是描述般度族和俱卢族之间为争夺王位而展开的战争，故又称《大战书》。然而，《摩诃婆罗多》主旨并不在歌颂战争，它极状战争之惨烈，意在止戈息武，彰显非战和平思想。在《妇女篇》中，国王坚战遭到强烈谴责：“数以千计的妇女围绕这位国王，痛苦地高举双臂哭诉着，不管这些话好听或难听：国王哪里通晓正法？哪里仁慈？他已杀死父亲、兄弟、老师、儿子和朋友们。”在

《和平篇》中，坚战对祝贺者说：“胜利对我来说如同失败。”《升天篇》描写坚战进入天堂后依然充满怨恨，天神让他到恒河沐浴，洗去凡心，才获得了天神的形体，摆脱了仇恨和烦恼，和所有的人在天国和谐相处。史诗以此作为全书的大结局，是对战争的最大否定和对和平的歌颂。

大史诗的非战和平思想，对当今世界有着积极意义。有学者指出，二战以后，人类在制止战争，限制生化武器、热核武器，判断和惩戒战争罪犯等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今天的局面也正是大史诗作者们幻想驾驭战争、限制战争，力争减少战争伤亡思想积淀的结果，是他们的这类思想首先闪现出了可贵的光辉。”环视当今世界，霸权主义横行，地区冲突和恐怖暴力不断。要彻底扭转这种局面，必须弘扬《摩诃婆罗多》中制约战争、反对暴力的思想，必须弘扬东方以和为贵、亲仁善邻的大同思想。

正义，是《摩诃婆罗多》的又一个主题思想。在印度文化中，正义（Dharma）是一个核心词汇，有宗教、真理、道、法、法则、规矩等多种意义，中国常常音译成“达磨”。整部《摩诃婆罗多》卷帙浩繁，内容丰富，但其宗旨就是弘扬正义，坚持真理。正义必胜是印度的全民理念，是维护印度社会公正的思想支柱。《摩诃婆罗多》使邪不压正、正义必胜的信念深入人心。而且，正义和非正义不是绝对的，它随着时间、地点及其它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即使正义在胸，也不能对非正义一方实施过度打击。《摩诃婆罗多》宣扬的是以“适度”、“相宜”为标准的正义观。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说，《摩诃婆罗多》是人类最早的一部《正义论》。它对正义的论述，“在人类历史上具有典型意义，因为正义和非正义，正法和非正法，善和恶之间的斗争从来就存在，而且贯穿过去一切时代，未来也将永无止

息，大史诗揭示了人类最伟大的真理。<sup>⑪</sup>印度学者契特也认为，“《摩诃婆罗多》的核心思想是达磨（正法）的最终胜利。”<sup>⑫</sup>

《摩诃婆罗多》关于非战和平的思想，关于正义和正义必胜的思想，正是我们要大力吸收的其他文化中存在的先进因素，《摩诃婆罗多》作为印度民族的思想结晶和文化圣典，在 21 世纪之初被全本翻译介绍到正在高速发展的文明古国中国，其意义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高。

[印]毗耶娑《摩诃婆罗多》（一），金克木、赵国华、席必庄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643页。

[印]斯·格·夏斯德利《史诗时代》，载季羨林、刘安武编《印度两大史诗评论汇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30页。

[德]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70页。

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上），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86页。

张松如、郭杰《周族史诗研究》，长春出版社，1998年。

黄宝生《摩诃婆罗多 导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43-144页。

[印]毗耶娑《摩诃婆罗多》（五），黄宝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2、4页。

[印]毗耶娑《摩诃婆罗多》（四），黄宝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915-916页。

⑪ 刘安武《印度两大史诗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85、148页。

⑫ [印]G·K·契特《中印学者畅谈中印合作与发展前景》，载《南亚研究》2006年第1期，第4页。

[作者简介] 郁龙余，1946年生，深圳大学教授、印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

责任编辑：严蓓雯